

Wittgenstein Conversations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

1949-1951

(美) 鲍斯玛 著
刘云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

1949-1951

著 鲍斯玛 (O.K.Bouwsma)
编 克拉夫特 (J.L.Craft)
哈斯特维特 (Ronald E.Hustwit)
译 刘云卿



漓江出版社

WITTGENSTEIN. CONVERSATIONS 1949 - 1951

© 1986 by J. L. Craft and Ronald E. Hustwit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ACKETT Publishing Co., Inc.

Simple character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ulama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cy, Rome, Ital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11-29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美)鲍斯玛(Bouwsma, O. K.)著;刘云卿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407-5510-2

I. ①维… II. ①鲍… ②刘… III. ①维特根斯坦, L. (1889-1951)-访问记 IV. ①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593 号

策 划:匪 席

责任编辑:吴晓妮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3.25 字数:75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译者前言

时至今日,维特根斯坦已然成为文化偶像,因而也未能规避一个文化偶像的命运:拥有了一切,除了被正确地理解。这本小书记下了维特根斯坦生命最后三年的言行,初看上去有点像《福音书》或《使徒行传》,或者波菲利为普罗提诺撰写的“行止”,它的朴实无华和意味深含甚至会让人想到那些伟大的神秘主义文献。但是,“圣徒”或“先知”的说法只是隐喻,除非重新界定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即便如此,维特根斯坦还是几近完美地刷新了自苏格拉底以降,那个被称为“哲学家”的形象;哲学治疗的意图,将哲学与行动相连,将人与哲学相连的努力,连同那种哲学难以规定的品质,对于我们和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来说拥有某种特别的启示和感召。

有鉴于此,行为与话语,人与哲学缺一不可,且不可分离。本书让维特根斯坦现身说法,将描绘与记录集于一身,鲍斯玛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其中的含混和摇摆使鲍斯玛免于占据苏格拉底的对话者的位置:维特根斯坦说那帮家伙全是笨蛋,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另外,对细节及行为的笔录与维特根斯坦对理论的拒斥,以及一个行动着的个人恰相呼应。既有其必

然性,似乎又是刻意为之。至于笔录本书的鲍斯玛,引论已详加记述,不再多言。书中的维特根斯坦年表和进一步的阅读材料,维特根斯坦的读者定然耳熟能详,但为了保持原书的完整性,仍然维持原样不变。

我要感谢 Professor Jane Heal 和 Professor Derek Matravers 的帮助,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会时常忆起消磨在老鹰酒馆的时光;我同样要感谢吴晓妮促成此书并提供意见;最后的并非最不重要,我要感谢 Cleo 的短暂陪伴。一如既往,翻译中的问题与他人无关。

刘云卿

2011 年 8 月 16 日 哈德威克

序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 1949—1951》是 O. K. 鲍斯玛的系列笔录,记录了那段时间他与维特根斯坦的很多次谈话。它是奥斯丁的坦萨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现存的鲍斯玛文集的一部分。鲍斯玛最初的记录以日记本的形式保存了下来,那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后来,那些与维特根斯坦相关的部分被做了分开规整和打印。鲍斯玛偶尔会把这些笔记或部分笔记拿给朋友们传阅,但无意出版它们。这些关及维特根斯坦的笔记因为本书而得以首次面世。我们对此做了编辑,去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并草拟了引言,旨在提供历史背景和一般的哲学指向。

对于《谈话录》的引言,我们要感谢肯尼斯·约翰逊教授,莫里斯·拉泽罗维茨,爱丽丝·安布罗斯·拉泽罗维茨,以及盖特露德·鲍斯玛-波斯夫人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芭芭拉·哈斯特维特打印文稿。我们同样要感谢鲍斯玛的家庭,奥斯丁的坦萨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及伍斯特学院的支持。正是后者的“学院发展基金”提供的几次支助才使得远游和文稿再版得以可能。

目 录

引言 1

维特根斯坦生平年表 21

谈话录 23

康乃尔(1949年7月) 25

斯密斯学院(1949年10月) 63

牛津(1950年8月—1951年1月) 70

进一步读物 91

引 言

奥特斯·卡欧克·鲍斯玛(Oets Kolk Bouwsma)1898年生于密西根的马斯基根(Muskegon),父母是美籍荷兰人。他在加尔文学院和密西根大学受教育,主修英国文学和哲学。早年他是唯心主义的信徒,尤其热衷黑格尔哲学,后来发现 G. E. 摩尔拒斥唯心主义的著作更加让人信服。他对摩尔用力甚勤,出版了一些论及摩尔的文章,并从他工作了近四十年的内布拉斯加大学输送了一些学生到剑桥跟随摩尔读书。作为一位年轻的哲学家,鲍斯玛的声誉与他的摩尔研究紧密相连。石里普(Schilpp)的《摩尔卷》(在世哲学家文库)中收录了鲍斯玛批评摩尔的文章,在摩尔的回应中能看出他对鲍斯玛的尊重。鲍斯玛因为在摩尔研究上的声誉而受邀在牛津主持约翰·洛克讲座,并成为美国哲学协会的主席。后来,他的声名更多地与维特根斯坦联系在了一起。

在那些因他的激励而远赴英国追随摩尔的学生中,有一个

人就是诺曼·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① 通过与摩尔一起工作,马尔康姆得以结识维特根斯坦,他参加的那些讲座和讨论班支配了他以后的哲学发展。战后,马尔康姆回到康乃尔讲授哲学,正是在那里他得以说服维特根斯坦于1949年访问康乃尔,并与那里的师生作了交流。马尔康姆还促成了鲍斯玛在维特根斯坦访问康乃尔期间去康乃尔任教。那时的鲍斯玛早已开始认真地研习维特根斯坦的口述笔录,那些笔录后来作为《蓝皮书》出版。

通过与维特根斯坦的接触,以及对《哲学研究》艰苦卓绝的阅读,鲍斯玛开始尝试把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运用到纷繁的哲学问题中去,诸如笛卡尔和贝克莱的怀疑论思想,以及时间、真理和思维这类永恒之谜,并因此崭露头角。他在内布拉斯加一直工作到1965年,通过他独一无二的讨论风格,以及他对哲学语句弦外之音的谛听,他对众多的研究生施加了最大的影响。虽然他从未间断写作,提交了数不清的论文,但生前只印行了一本著作,那是一篇文章结集,名叫《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从内布拉斯加退休后,他接受了来自坦萨斯大学的邀请。以同样的方式他延续着自己的影响,直到1978年去世。那时的他一如既往地活跃和多产。他的文章和笔记(后者用去了数百个标准拍纸簿)自他去世后被保存在奥斯丁的坦萨斯人文研究中心。他的两本文集已经出版,分别是《走向一种

① 诺曼·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 1911—1990),维特根斯坦后期最为亲近的学生和朋友之一,也是一位特别的维特根斯坦学者,写有 *Nothing Is Hidden* 和 *Wittgenstein: A Religious Point of View*,等等。但马尔康姆不是波菲利,他是诠释者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在未来的岁月中,他只会作为《回忆维特根斯坦》的作者被铭记。——译注。后同。

新的感性》(*Toward A New Sensibility*)和《失却证明或判据》(*Without Proof or Evidence*)。

1949年7月,在马尔康姆的邀请和鼓动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来到康乃尔大学,并住在马尔康姆家中。根据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中的记录,在维特根斯坦访问期间,如下哲学家曾经得其亲炙:约翰·内尔森(John Nelson),威利斯·道内(Willis Doney),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斯图尔特·布朗(Stuart Brown),还有一些康乃尔的研究生。鲍斯玛也在场,由于马尔康姆的邀请,他从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赶过来。

根据马尔康姆,维特根斯坦跟这些人有过不同的交谈,有些分开进行,有些在一起,讨论涵盖了整个夏天,直到秋天。说到鲍斯玛,他记述道:“在与奥特斯·鲍斯玛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读了弗雷格的《意义与指称》;针对这个问题有过两次或三次讨论,维特根斯坦阐述了他与弗雷格的分歧。在其中一次会谈中,我们探讨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第二版,第70页)对这些讨论的记录出现在鲍斯玛的笔记中,同时还有上面提及的康乃尔的哲学家们。他的笔记不止这些,还包括了许多被广泛探讨的论题。有一些与马尔康姆的讨论鲍斯玛没有参加,对摩尔文章的讨论后来在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中得以成形,恐怕还有一些讨论没有记录下来。

阅读这些笔记的人很快会发现,鲍斯玛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同寻常,那基于对彼此的人格深度和哲学严肃性的认可。有一点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是老师,鲍斯玛是学生。但是,鲍斯玛该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学生才能让维特根斯坦敞开如斯,他们的会谈又该多么有趣,那必定何等深刻地影响

了鲍斯玛。

在康乃尔的那个夏天,鲍斯玛与维特根斯坦的会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有时他们在某一个人家里举行小型聚会;有时,鲍斯玛、维特根斯坦与马尔康姆在后者的花园或地下室见面。维特根斯坦常常与鲍斯玛一起散步,或者鲍斯玛开车带维特根斯坦一道去手指湖(Fingerlake)的乡下。一如他们后来的那些交谈,在他们的这些散步途中,通常是鲍斯玛提出一些论题,维特根斯坦迅速付之探讨。他们的关系不是辩证性的,鲍斯玛并不反驳或提供反证。相反,在记录维特根斯坦那些评论的同时,他在寻求它们的意义,竭力去理解它们。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试着去理解对方,鲍斯玛很吃力地咀嚼着维特根斯坦的洞见和图像。

这种在散步中探讨哲学问题的操练持续地贯穿了他们的友谊。莫里斯·拉泽罗维茨(Morris Lazerowitz)也在一封信中提到这同一种练习,他指的是维特根斯坦于十月中旬去马萨诸塞北安普顿的史密斯学院造访鲍斯玛。“维特根斯坦在北安普顿鲍斯玛那里滞留了两三天,”拉泽罗维茨解释说,“期间维特根斯坦与奥特斯一起散步讨论,主要是维特根斯坦在说。”这类散步在笔记中被反复提及,并成为他们最常见的交谈背景。

鲍斯玛去史密斯学院担任那个秋季学期的公休替补。由于他的朋友莫里斯·拉泽罗维茨和爱丽丝·安布罗斯·拉泽罗维茨(Alice Ambrose Lazerowitz)的帮助,他得以坐稳这个位置。鲍斯玛与妻子盖特露德,及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格雷琴一起从康乃尔搬到那里。笔记中几次提到她们,维特根斯坦不止一次跟格雷琴讨论她的学校作业,然后过渡到与鲍斯玛探讨文学和教育。1949年10月11号的笔记显示,他们重又开始了

他们的散步和讨论。维特根斯坦停留了三天,不久后他于十月底返回了英格兰。他们的下次会面要等到第二年的夏天。

鉴于他在摩尔研究上的声誉,鲍斯玛被邀请去牛津主持1950—1951年的约翰·洛克讲座。被邀请是一种殊荣,鲍斯玛是第一个主持这个讲座的美国人。在那一年的许多时间,维特根斯坦也住在牛津。他花了五个星期去挪威旅行,并回了剑桥几趟,爱德华·贝文博士(Dr. Edward Bevan)在那里为他治疗(那时的维特根斯坦已被确诊患了癌症)。但他大部分时间呆在牛津,这为他们提供了重叙友谊的机会,他们也得以重新开始哲学操练。经过了九个月的间断,鲍斯玛的笔记从1950年8月17日开始,直到维特根斯坦1951年4月去世。不过,读者会注意到,探讨本身远多于对日期的关注。

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已经病得很重,但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可以工作,并能够精神饱满地参与讨论;有时状态糟糕,几至无力工作。鲍斯玛夫人常常会为他准备清汤和苹果沙司。在给马尔康姆的一封信里他曾提到:“我现在只能跟一个哲学家一起吃苹果沙司。”尽管人在低潮,无力工作,但笔记仍然展现出一颗清晰、有力的心灵。

在牛津那段时间,鲍斯玛与维特根斯坦继续着他们一起散步探讨哲学的操练。有时他们坐在外面的长凳上,有时维特根斯坦会去鲍斯玛家吃饭,或者拉着鲍斯玛出去散步。散步讨论似乎已成规范:“今天我们散步……今天我们在草坪上散步……今天我们沿着运河散步。”这隶属于逍遥学派的传统。

没有记录显示,其他人曾经参与过这些讨论。安斯康^①当时就在牛津,维特根斯坦还把鲍斯玛介绍给他的朋友兼学生约里克·斯梅希斯。^② 鲍斯玛有时会提及安斯康和斯梅希斯的一些见解,但笔记没有任何有关他们或其他哲学家参与讨论的记录。所记录的讨论始终在鲍斯玛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展开,涉及的论题要么由鲍斯玛引入,要么即兴地由他们散步中所看到或提到的某个问题引发开去。这是鲍斯玛的机会,得以接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他没有浪费这次机会。

当鲍斯玛两年后的 1951 年回到内布拉斯加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朋友、也是他以前的学生肯尼斯·约翰逊(Kenneth Johnson),说维特根斯坦震撼了他,是他平生所见过的“最高度的明晰,最深沉的理智活动,最敏锐和最热忱的心灵。就像奇迹!他的言词像闪电穿越迷雾般地贯穿了几乎所有的谈话”。几个星期后,1951 年 12 月 1 日,在为一个讨论班所做的笔记中,他就先知的本性做了如下评说:

先知该当若何? 维特根斯坦是我所知道的最接近先知的人。作为人他像一座高塔,高耸而独立,无所依傍。他独立不羁,不惧怕任何人。“没有什么可

① 伊莉莎白·安斯康(G. E. M. Anscombe, 1919—2001),维特根斯坦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后为剑桥大学教授。她是《哲学研究》的英译者,《意向性》的作者,并创造性地把维特根斯坦激发的灵感投射到众多哲学问题和哲学史的研究中去,从笛卡尔溯至亚里士多德,再到巴门尼德。死后被葬在剑桥的圣吉尔斯(St. Giles),就在维特根斯坦墓地的近旁。

② 约里克·斯梅希斯(Yorick Smythies),是晚期维特根斯坦最赏识的学生之一,也是少数接受他的训导,放弃成为“职业哲学家”的学生之一。除他以外,还有下面提到的德劳瑞(M. Drury, 1907—1976)医生。

以伤害到他!”但是,其他人却惧怕他。为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他可以袭击他们,掠走他们的财富,污损他们的名声。他们害怕他的评判。我也害怕维特根斯坦,害怕为他背负的责任。我自始至终都知道与他一起散步讨论的机会多么地值得珍视,同时我也害怕他会过来,害怕与他相伴的那些时光。我同样害怕要把我的洛克讲座的提要给他,我答应去做那个讲座,是因为他拒绝了它。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他去挪威,接着又去剑桥的那段时间,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对于我要说的一切,他都是我的判官,对于他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能耸耸肩或者搪塞说:何必在乎呢?当他走开的时候,我感到自由。

我不认为我对任何其他他人有过类似的感受。毫无疑问,我怕他,同时我也明白,我的工作的所有希望都拜他所赐。他的话语让我视若至宝,现在一如既往。重要的是,是他拿走了我因自身平庸而来的那种慵懒的舒适。没有任何人让我欠债如许,没有任何人让我谛听如斯,没有任何人让我害怕若此,没有任何人让我如此相形见绌。我没有目睹也没有听闻任何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这是我的判断。看到维特根斯坦出错几乎是一种宽慰。

不管怎样,结识维特根斯坦让我隐约地觉得先知的力量撒向了他的民众。“主如是说”(Thus saith the Lord)称得上那种存在的标志,它超拔于所有的恐惧和诱惑,所有的无惧和所惧之物,审判和良知。主如是说!

这双眼睛洞察秋毫，明辨一切，深知如何区分垃圾与黄金，在它们的注视和疑问下工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垃圾！”

斯年伊始，鲍斯玛的笔记本开始呈现出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都非常熟悉的那种形式。那包括笔记的长度，记笔记的耐心，并尝试把所记录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手法为自己所用。最常见的就是为讨论班的学生所做的准备及回应，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或者其他哲学著作，或者与朋友及同事讨论的记录。出版于1953年春天的《哲学研究》为鲍斯玛提供了最佳精神食粮，直到他1978年去世。他一再地回到《哲学研究》的主题，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述它们，并付之例证和使用。他无数次地以不同的方式在笔记本上探讨如下问题：一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去关注那种错误的观念，即把词的意义看做它所指称的事物。

对鲍斯玛来说，通过独自思考而成就的写作与工作操练始终存在，但是，从事哲学的崭新方向和方式则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戏剧性地出现在1951年。十年后，又是在写给肯尼斯·约翰逊的信中，鲍斯玛评论说：“有一点我很清楚，除非一个人能够独自思考，而不是重复维特根斯坦说过的话，否则他就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那种独自思考意味着旷日持久的操练。”正是在他的笔记本里，鲍斯玛获取了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

鲍斯玛的笔记本见证了他的工作习惯因与维特根斯坦的会见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那是1939年夏天,我与拉泽罗维茨夫妇访问新英格兰期间,我第一次接触到学生的维特根斯坦课堂笔记。《逻辑哲学论》,你想必听说过,要早得多了,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当然听说过维特根斯坦,但主要是通过我以前的两位学生马尔康姆和拉泽罗维茨,相信我曾经跟你谈起过他们。是啊,尽管维特根斯坦反对,那些笔记还是流传了开来。读过以后,它们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已准备好去直面我所遭遇的革命性思想。摩尔研究因资料匮乏已经停止。我深耕田地,维特根斯坦种子般地撒落下来。整整十年,我竭力铲草、锄地、浇水,推敲着我在那些笔记中寻找到的深意。

尽管那些笔记对这种转变至关重要,但对鲍斯玛所施加的最大影响却来自与维特根斯坦的会见。在此类私人化的会面中,他学会了“害怕他的判断”,“珍视他的言词”,并开始明白:他,鲍斯玛,“被剥夺了慵懒的舒适”。这些意味强烈的措辞被一个人用来讲述与另一个人的关系。

这些笔记的读者或许会问:究竟是什么,一如这些谈话所反映的那样,使得维特根斯坦让鲍斯玛印象如此深刻?《谈话录》涉及《哲学研究》基本论题的地方相对较少。只有一两次谈到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甚至那个想法也只是一带而过。同样,读者也没有觉得维特根斯坦在向鲍斯玛阐发自己的哲学,或者试图向鲍斯玛传授他的真实意谓。因此,让鲍斯玛敬畏的并非某种新的哲学或教条。那是些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呢?

《谈话录》从对维特根斯坦的描绘开始,那是鲍斯玛的第一印象。鲍斯玛驱车赶到火车站去迎接从纽约抵达的维特根斯坦和马尔康姆。他谈及维特根斯坦的平易和友好。这看上去让鲍斯玛放松了许多,因为有太多关于维特根斯坦难于相处的报道。在第一次讨论中,鲍斯玛发现“确乎有一种狂暴(intensity)和不耐烦,那足以吓着别人”。他继续评论说,他怀疑维特根斯坦是否能够愉快地容忍那些傻话和不智。接着,鲍斯玛没有躲避维特根斯坦的审视,因为他相信,把自己交托给维特根斯坦的严厉评判,从中可以获益良多。正是维特根斯坦的狂暴和严苛的判断支配了最初的这些印象,并贯穿整个《谈话录》。维特根斯坦始终在思索,是艰苦卓绝的思索,哪怕针对的是细小之物。鲍斯玛评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散步者,他回应说自己全然不是。并非特意要使问题变得困难,他毋宁只是很认真地对待鲍斯玛的问题,即便是很小的问题。当鲍斯玛夫妇被邀请到马尔康姆家喝茶时,马尔康姆、鲍斯玛和维特根斯坦单独就座,以便与非哲学家们隔离开来,维特根斯坦不能容忍那些社会闲扯。一旦开始讨论哲学,所需的心智能量就会异常巨大,这时候,维特根斯坦的狂暴就愈发让人印象深刻。

哲学中的狂暴有多种形式。读者会在维特根斯坦迅速回应鲍斯玛的论题,他的第一反应时常能够切中要害等方式中看到这一点。比如,当鲍斯玛提议讨论一下享乐主义,尤其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基于快乐而已。维特根斯坦立刻做出评论:“这显然不是一个经验评论。”他随后展开了那个思路。这是某种有着巨大哲学价值的宝藏。它电光火石般地昭示出享乐主义的核心判断乃是一种抽象,借此所有的人类行为均被观照,不允许有任何反例。它提醒我们注意,我们